

从选举政治到广场政治：埃及穆巴拉克时代的民众政治参与^{*}

哈全安 张楚楚

内容提要 穆巴拉克时代，常态化的议会选举提供了民众政治参与的合法渠道，民众力量的崛起形成了民主化进程中涌动的暗流和选举政治的社会基础。然而，选举政治的官方操纵性与民众参与性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悖论倾向，导致威权体制的延续与民主化的政治诉求陷于无法克服的矛盾境地。“缺乏民主的选举”势必演变为“抛弃选举的民主”，从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演变为自下而上的广场政治注定成为导致埃及政治深刻变革的历史路径。

关键词 埃及 穆巴拉克 选举政治 广场政治 民众参与

作者简介 哈全安，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192）；张楚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东史专业研究生（天津300192）。

穆巴拉克执政的30年，是埃及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威权体制的松动与民主化的暗流涌动，构成穆巴拉克执政期间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现象。选举政治的初步实践无疑提供了民众参与的合法渠道，而从官方主导的选举政治到自下而上的广场政治标志着民主化的长足发展。本文试图以官方与民众的政治博弈作为切入点，考察穆巴拉克时代选举政治的合法性和局限性，分

^{*}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12BSS014）的阶段性成果。

析选举政治与广场政治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进而探讨此间埃及民众政治参与的历史走向,敬请方家赐教。

威权国家与议会选举

民主化运动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而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构成民主化运动的社会基础。1923~1952 年是埃及历史上的宪政时代,选举政治初露端倪,诸多政党粉墨登场,通过议会选举的形式角逐于政治舞台。此间的议会选举具有精英政治的浓厚色彩,下层民众的政治参与尚且处于朦胧状态,徘徊于宪政和选举的政治边缘。纳赛尔时代,奉行“发展的独裁模式”,长期实行一党制,威权政治极度膨胀。纳赛尔作为总统凌驾于社会之上,被视作国家权力的化身、民族尊严的象征和民众意志的体现,俨然是埃及民众心目中“仁慈的君主”,自下而上的民众政治参与徒具形式。

萨达特出任总统以后,致力于所谓的“纠偏运动”,埃及的政治力量经历重新组合的过程,民主和人权成为萨达特标榜的政治原则。1971 年,萨达特宣布保护民众权利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改组执政党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鼓励在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政治框架内发表不同意见。^①萨达特在 1974 年颁布的《十月文件》中声称,“纠偏运动”的目的是撤销所有的非常措施,确保法律和秩序的稳定,使埃及成为真正的宪政国家,进而承诺实行自由化政策,释放纳赛尔时代在押的政治犯,改革司法制度,取消新闻审查制度。1976 年,萨达特正式推行所谓“崭新的民主试验”,宣布废除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允许反对派政党合法存在,威权体制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②然而,萨达特执政期间的政治改革处于官方的主导之下,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尚未触动威权国家的政治根基,从一党制向多党制的转变源于当权者的恩赐,政治原则与政治现实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自下而上的民众参与微乎其微。1971 年颁布的宪法明确强化以总统为权力核心的国家体制,规定总统可连任两届。1980 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不受任期限制,可连选连任。1971 年宪法因此被称作“萨达特宪法”,而萨达特本人则声称自己及其前任

① Beattie, K. J., *Egypt During the Sadat Years*, New York, 2000, p. 79.

② Baker, R. W., *Egypt's Uncertain Revolution Under Nasser and Sada*, Harvard, 1978, pp. 150 - 165.

纳赛尔是“埃及最后的法老”。^①

穆巴拉克时代，埃及延续威权国家的政治传统，总统制构成国家体制的中枢和政治体系的核心，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权力对比处于严重失衡的状态，内阁则处于从属总统的地位。始建于1978年的民族民主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控制国家机器，操纵选举，在议会中长期处于一党独大的地位，而议会俨然是“民族民主党的分支机构”。^② 紧急状态法自1981年萨达特遇刺之后长期实施，授权安全机构限制民众的结社集会和反对派的政治活动，直至无需正常的司法程序拘捕公民并送交特别军事法庭审理，是穆巴拉克时代威权体制的重要标志。^③ 尽管如此，进入穆巴拉克时代，威权体制的松动迹象进一步显现。1984年，议会颁布法令，重建由资深法官组成的最高司法委员会，行使独立于总统和政府的司法权力，负责任命法官和管理法庭，受理组建政党的申请和裁定反对派政党的法律地位。^④ 诸多反对派政党在向政府主导的政党委员会提交申请而遭到拒绝之后，通过司法机构的诉讼程序，由最高司法委员会裁定，取得合法地位。^⑤ 司法机构的独立化进程和政党政治的活跃标志着穆巴拉克时代政治生活的悄然变化，而常态化的议会选举提供了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途径。

1983年，议会颁布第114号法令，修改选举法。该法令规定，议会设448个席位，全国划分为48个议会选区，候选人必须以政党名义登记参选，选票不足8%的政党不能获得议会席位，其所得选票转归获得选票最多的政党。^⑥ 1984年，埃及举行穆巴拉克执政后的首次议会选举，民族民主党赢得72.9%的选票和87%的议会席位，新华夫托党与穆斯林兄弟会组成的竞选联盟赢得15%的选票和13%的议会席位，新华夫托党由此成为首个进入议会的反对派政党，另外3个反对派政党社会主义工党、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和自由党分

① El - Ghobashy, M., "Unsettling the Authorities: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Egypt", *Middle East Report*, No. 226, Spring 2003.

② Fahmy, N. S., *The Politics of Egypt: State - Society Relation*, London, 2002, p. 95.

③ Shehata, D., *Islamists and Secularists in Egypt: Oppositi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London, 2010, p. 95.

④ Ibid., p. 35.

⑤ Rutherford, B. K., *Egypt After Mubarak, Liberalism, Islam and Democracy in the Arab World*, Princeton, 2008, pp. 72 - 73.

⑥ Kassem, M., *Egyptian Politics: The Dynamics of Authoritarian Rule*, Colorado, 2004, pp. 59 - 60.

别赢得 7.7%、4.1% 和 0.7% 的选票，均无缘进入议会。^①

1986 年，议会颁布第 1988 号法令，再度修改选举法。根据修改后的选举法，独立人士获准参与竞选议会席位，同时规定：在全部 48 个选区中，每个选区登记参选的独立人士只限一人，余者必须以政党名义登记参选。^② 在 1987 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赢得 475 万张选票和 309 个议会席位，得票率和赢得的议会席位均低于 1984 年的议会选举，仅仅占据 79% 的议会席位；相比之下，反对派政党和独立人士赢得 207 万张选票和 130 个议会席位，得票率和赢得的议会席位均高于 1984 年的议会选举，其中社会主义工党、自由党与穆斯林兄弟会组成的竞选联盟赢得 56 个议会席位，新华夫托党赢得 35 个议会席位，独立候选人赢得 39 个议会席位。^③

1990 年，宪法法院裁定 1987 年议会选举违宪，取消对于独立候选人的参选限制，同时将选区由 48 个改为 222 个。^④ 同年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新华夫托党、自由党、社会主义工党和穆斯林兄弟会宣布抵制议会选举，民族民主党提名的候选人和来自执政党的独立候选人赢得 360 个议会席位，占议会全部席位的 86%，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赢得 5 个议会席位，来自反对派政党和组织的独立候选人赢得其余 79 个议会席位。^⑤

1995 年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赢得 417 个席位，占据议会全部席位的 94%，达到穆巴拉克执政以来的最高比例，反对派政党新华夫托党赢得 6 个席位，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赢得 5 个席位，自由党和穆斯林兄弟会分别赢得 1 个席位，来自非执政党的独立候选人赢得 13 个席位。^⑥

2000 年的议会选举，可谓埃及选举政治发展历程的重要转折点。2000 年 7 月，宪法法院裁定，选举程序必须置于司法机构的全面监督之下。此前，根据 1956 年宪法第 24 款，司法机构只是监督选举程序的参与者，政府则是选举程序的实际控制者。包括 14 个合法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和独立候选人在内的 4 259 人登记竞选议会席位，其中执政党提名 444 名候选人，反对派政党提名

① Tripp, C., *Egypt Under Mubarak*, London, 1989, p. 13.

② Fahmy, N. S., *op. cit.*, p. 70.

③ Ayubi, N. N., *The State and Public Policies in Egypt since Sadat*, Oxford, 1991, p. 98.

④ Kassem, M., *op. cit.*, p. 61.

⑤ Kienle, E., *A Grand Delusion, Democracy and Economic Reform in Egypt*, London, 2001, pp. 53 - 54.

⑥ *Ibid.*, pp. 61 - 62.

172 名候选人，余者为非政党提名的独立候选人。^① 选举结果是，执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和来自执政党的独立候选人分别赢得 170 个席位和 218 个席位，反对派政党赢得 16 个席位，其中新华夫托党赢得 7 个席位，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赢得 6 个席位，纳赛尔党赢得 2 个席位，自由党赢得 1 个席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作为独立候选人赢得 17 个席位，其他独立候选人赢得 21 个席位。^② 与 1995 年相比，民族民主党在 2000 年议会选举中赢得的席位有所下降，而选举程序的司法监督无疑是导致选举结果发生改变的重要原因。

2005 年的议会选举期间，成立议会选举高级委员会，负责监督选举活动，非政府组织指派的监督员参与选举监督，选举程序的公正性和透明度有所提高。此外，执政党的 444 名候选人来自选区提名，而不再是由民族民主党领导机构提名。世俗反对派竞选联盟提名 320 名候选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依然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议会席位的角逐。^③ 执政党赢得 265 个议会席位，具有执政党背景的独立候选人赢得 46 个议会席位，穆斯林兄弟会赢得 88 个议会席位，世俗反对派政党联盟共计赢得 9 个议会席位，其中包括新华夫托党 6 个席位，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自由党和明日党各赢得 1 个席位。^④ 继 2000 年议会选举之后，执政党在 2005 年的议会选举中再度遭遇败绩，民族民主党占据的议会席位比例进一步下降，穆斯林兄弟会成为议会最大的反对派势力，而世俗反对派政党显然已经无力对抗执政党，亦无力与穆斯林兄弟会角逐。

穆巴拉克时代，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主要表现为议会选举的政治框架下民众与官方之间的博弈。议会选举无疑是评判政治环境和衡量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而议会席位的分配比例折射着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的力量对立。穆巴拉克时代议会选举的实践表明，威权国家的政治传统与民众参与的选举政治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悖论倾向。一方面，常态化的议会选举提供了民众表达政治诉求和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渠道和外在形式，另一方面，执政党长期坐大，导致官方与民众的政治力量对比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民众合法的政治参与十分有限。威权国家体制下的议会选举，尚且无法颠覆民族民主党

① Latif, O. A., "Egyptian Electoral Politics: New Rule, Old Game",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28, No. 88, June 2001.

② Fahmy, N. S., op. cit., p. 87.

③ Arafat, A. D., *The Mubarak Leadership and Future of Democracy in Egypt*, New York, 2009, pp. 123 - 126.

④ Banks, A. S., *Political Handbook of the Middle East 2008*, Washington, 2008, p. 139.

作为执政党在埃及政治舞台长期占据的主导地位，反对派与执政党之间无法通过议会选举的方式实现政治权力的和平移交。

选举政治的社会基础

纳赛尔时代的威权政治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自上而下的官方行政干预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民众缺乏必要的自主地位而长期处于依附政府的状态。萨达特执政期间，推行以非国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新经济政策，鼓励私人投资，发展民营经济，进而拉开自由化经济改革的序幕。穆巴拉克出任总统后，继续推进自由化经济改革，政府干预的减少和私人经济的活跃成为埃及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现象，由此导致的社会后果是新阶层的兴起和旧力量的此消彼长，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拓展私人空间的民众呼声随之日渐高涨。穆巴拉克时代的议会选举，处于从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型的特定环境之下。经济秩序的变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反对派政党的建立和伊斯兰主义的转向，提供了民众通过议会选举实现初步政治参与进而挑战威权国家的重要条件。民众力量的崛起，形成民主化进程中涌动的暗流和选举政治的社会基础。

所谓公民是相对于传统文明时代的臣民而言的法律概念，其核心内涵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公民社会的成长与自下而上的民众政治参与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以民间性、自主性、多元性和公众参与性为鲜明特征的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标志。穆巴拉克时代，随着威权体制的松动、经济秩序的剧烈变革、政府职能的转化和私人空间的扩大，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表现出日渐活跃的张力，进而提供了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实现民众动员和推动民众政治参与进程的重要外在形式，加速着公民社会的成长。根据埃及的法律规定，所有非政府组织必须在政府登记注册，任何非政府组织不得从事政治活动和与政治相关的其他活动。据统计，正式注册的非政府组织，1976 年约为 7 500 个，2005 年增至约 20 000 个。^① 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各类行业协会素有明显的政治参与倾向，是最具活力的非政府组织。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埃及最大的反对派宗教政治组织，在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各类行业协会中

^① Shehata, D., op. cit., p. 282.

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而知识界和工商界的各类行业协会提供了穆斯林兄弟会动员民众和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载体。80年代末，埃及约有13 000个非政府组织，其中超过1/3处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控制之下。^①1992年，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律师协会举行的理事会选举中赢得全部25个席位中的18个席位，在工程师协会举行的理事会选举中赢得全部61个席位中的45个席位，在医师协会举行的理事会选举中赢得全部25个席位中的20个席位，在药剂师协会举行的理事会选举中赢得全部25个席位中的17个席位。^②埃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是工会联盟，据称成员超过300万人。^③2003年，政府颁布法令，给予工人罢工的权利，同时规定罢工须经工会联盟的批准。^④法官俱乐部始建于1939年，长期保持独立于政府的自治传统，在制衡行政权力干预司法事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⑤人权组织作为新兴的非政府组织，缘起于80年代初。阿拉伯人权组织创建于1983年，是埃及第一个非官方性质的人权组织。^⑥至2005年，人权组织约有50个，主要关注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以及保护弱势群体和边缘阶层。2002年，宪法法院颁布第84号法令，正式承认人权组织的合法地位。2003年，成立人权组织全国会议。2005年，人权组织获准参与监督议会选举。^⑦此外，遍布全国的清真寺亦具有民众招募和社会动员的巨大潜力，同时具有多重的社会福利功能和政治影响力。新旧经济秩序更替过程中崛起的新兴阶层无疑是诸多非政府组织的重要社会基础，而伊斯兰主义的广泛实践赋予成长中的公民社会以日渐浓厚的宗教色彩。

政党政治是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政党政治的发展水平则是衡量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与纳赛尔时代和萨达特执政期间相比，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反对派政党的合法化侵蚀着威权国家的政治根基。诸多反对派政党区别于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伊斯兰主义，强调民主政治的世俗性，以“宪法是出路”作为标志性的竞选口号，构成挑战威权政治的世俗

① Bayat, A., *Making Islam Democratic,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ost - Islamist Turn*, Stanford, 2007, p. 43.

② Arafat, A. D., op. cit., pp. 117 - 118.

③ Norton, A. R., *Civil Society in the Middle East*, Leiden, 1996, V. 1, p. 37.

④ Shehata, D., op. cit., p. 45.

⑤ Rutherford, B. K., op. cit., pp. 72 - 73.

⑥ Posusney, M. P.,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Middle East: Regimes and Resistance*, Boulder, 2005, p. 199.

⑦ Shehata, D., op. cit., p. 37.

阵营。其中,右翼反对派政党持相对温和的自由主义立场,强调民主、市场经济、教俗分离的原则,支持者主要来自民间富有阶层;左翼反对派政党具有不同程度的激进倾向,强调社会公正和政府主导的经济秩序,主要代表社会中下阶层的政治诉求。^①新华夫托党系宪政时代首屈一指的议会政党华夫托党的政治延伸,曾经被萨达特称作“从博物馆里逃出的木乃伊”。^②80年代,新华夫托党是世俗反对派阵营的中坚力量,也是议会最大的反对派政党,倡导民主制、私有化、民族性和世俗原则。进入90年代,新华夫托党内部出现政见分歧,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2005年,新华夫托党领导人诺曼·戈玛雅参加埃及历史上首次总统竞选,赢得3%的选票。^③艾曼·努尔原为新华夫托党成员,曾经于1995年和2000年两次当选议员,因与新华夫托党领导人政见不和,2004年创建明日党,自居为宪政时代华夫托党的真正继承者,标榜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致力于争取非政府组织的支持和扩大社会基础,进而成为在世俗领域挑战执政党的新兴政治势力。艾曼·努尔于2005年参与总统竞选,赢得7%的选票,成为政坛新秀。^④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脱胎于萨达特执政期间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左翼论坛,支持者大多来自国有企业雇员、工会联盟和乡村农民,主张抑制不断加剧的贫富分化和捍卫社会公正,具有纳赛尔主义的政治倾向。该党致力于参与议会选举,1984年赢得4%的选票,1987年赢得2%的选票,皆无缘进入议会。自90年代开始,该党在历届议会选举中均赢得席位,成为议会少数党。^⑤社会主义工党亦具有左翼色彩,持民族主义和亲伊斯兰主义的立场,标榜“安拉与人民”的政治原则。^⑥社会主义工党领导人易卜拉欣·舒克里和该党刊物《人民报》主编阿迪勒·侯赛因曾经公开承认其支持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⑦进入新世纪,随着2000年巴勒斯坦大起义和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左翼反对派政党在埃及政坛日渐活跃,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反对伊拉克战争和争取民主成为左翼反对派政

① Shehata, D., op. cit., p. 74.

② Fahmy, N. S., op. cit., p. 77.

③ Shehata, D., op. cit., p. 76.

④ Ibid., p. 77.

⑤ Ibid., p. 74.

⑥ Tripp, C., op. cit., p. 33.

⑦ Shehata, D., op. cit., p. 75.

党关注的核心内容。^① 然而，诸多反对派政党尽管具有合法地位，却长期处于弱势状态，官方制定的政党法和选举法对于反对派政党动员民众和参与议会选举限制颇多。官方极力为反对派政党划定红线，反对派政党的政治活动局限于官方可控的范围。80年代，反对派政党在选举政治上尚有所作为，1984年赢得25个议会席位，1987年赢得28个议会席位。在此后的议会选举中，反对派政党屡屡失利，4届累计仅赢得50个席位。^②

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的主要载体，始建于1928年，宪政时代致力于多党制议会选举之政治框架外的民众动员和政治运动，具有浓厚的激进色彩。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崇尚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政治原则，强调教俗合一的国家体制和伊斯兰教法的全面实施，主张实现民众积极的政治参与，却明确反对政党政治，否认穆斯林兄弟会具有政党属性。^③ 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调整政治策略，试图在议会选举的框架下寻求新的政治空间，致力于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选举，主张通过议会竞选的形式角逐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目的，政治立场趋于温和。^④ 1994年，穆斯林兄弟会撰文强调宪政框架下公正自由的议会选举是保障权力分割和制约进而完善民主政治的必要方式，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赞赏多党制的竞选制度，承认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⑤ 进入新世纪，穆斯林兄弟会开始致力于“没有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宣布尊重民主选举的政府，承认任何宗教信仰的公民在公平的政治环境下竞选总统的权利。^⑥ 2004年，穆罕默德·阿其夫出任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重申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立场即致力于推动民主化进程，倡导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实现权力交替。^⑦ 然而，由于官方严禁组建宗教政党，穆斯林兄弟会无法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只能与其它世俗反对派政党组成竞选联盟，或者以独立候选人的名义竞选议会席位。议会选举是穆斯林兄弟会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途

① Shehata, D., op. cit., p. 68.

② Ibid., p. 75.

③ Sullivan, D. J., *Islam in Contemporary Egypt*, Colorado, 1999, p. 42.

④ Ibid., p. 51.

⑤ Shehata, D., op. cit., p. 55.

⑥ El - Ghobashy, M., "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Egyptian Muslim Broth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 37, No. 3, August, 2005.

⑦ Browsers, M. L.,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Arab World*, Cambridge, 2009, pp. 123 - 124.

径,然而几乎在每次议会选举期间政府都要对穆斯林兄弟会发动政治攻势。尽管如此,穆斯林兄弟会无疑具有广泛的社会渗透力和政治影响力,是穆巴拉克时代最重要的反对派组织,在实现民众动员和推动民众政治参与的进程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实现民众动员和推动民众政治参与的历史舞台。“伊斯兰是出路”既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标志性竞选口号,亦是反映民众诉求的政治呼声。2005 年议会选举,穆斯林兄弟会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来自 21 个省的 88 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进入议会,反映出穆斯林兄弟会动员民众实现政治参与和竞选议会席位的巨大政治能量。^①

穆巴拉克时代,诸多世俗反对派政党与穆斯林兄弟会尽管皆致力于挑战威权国家的政治体制,积极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众政治参与,却在意识形态层面不无分歧,立场各异,难以形成打破民族民主党权力垄断局面和颠覆民族民主党统治地位的政治合力。一方面,世俗反对派政党既对穆巴拉克政权心存不满,亦对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宗教倾向疑虑重重,摇摆于官方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另一方面,穆斯林兄弟会缺乏明确清晰的政治目标,只是笼统地强调“伊斯兰是出路”的口号和主张实施伊斯兰教法。至世纪之交,穆斯林兄弟会逐渐更新政治理念和调整政治策略,淡化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色彩,试图弥合反对派阵营的教俗分歧,打破教俗反对派之间的政治隔阂,进而扩大与世俗反对派的政治合作,政治天平随之开始向反对派阵营倾斜。2005 年秋,穆斯林兄弟会与诸多反对派政党筹划创建“争取变革全国联盟”,强调保障公民权利、废除紧急状态法、实行自由选举的世俗政治诉求,试图实现教俗反对派阵营的广泛联合,共同推动政治改革进程。^②穆斯林兄弟会极力淡化宗教色彩,强调“要参与,不要统治”的政治,避免与其他反对派候选人直接竞争议会席位。^③与此同时,诸多世俗反对派政党亦逐渐承认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政坛的重要地位,接受与穆斯林兄弟会寻求合作的立场和策略,甚至支持穆斯林兄弟会获得合法的政党地位。^④

① Shehata, S., “The Brotherhood Goes to Parliament”, *Middle East Report*, No. 240, Fall 2007.

② Shehata, D., op. cit., p. 103.

③ Brown, N. J., *Between Religion and Politics*, Washington, 2010., p. 25.

④ Zahid, M., *The Muslim Brotherhood and Egypt's Succession Crisis*, p. 173.

广场政治与穆巴拉克政权的终结

穆巴拉克出任总统之初，以民主化进程的推动者自居，表示无意垄断国家权力和谋求延长总统任期。“我深信，民主制是未来的保证……我反对集权政治，不希望垄断国家决策，因为国家属于我们所有人，人民有责任分享国家的决策权”。然而，随着权力和地位的逐渐巩固，穆巴拉克于1986年告诫民众：“埃及实行充分民主制的条件尚不成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① 1999年，教俗各界反对派人士参与成立的“政治与宪法改革委员会”呼吁通过修改宪法，推动政治改革进程，限制总统权力，结束紧急状态，以议会内阁制取代总统制，强调“埃及人民应当重新获得民主和举行自由选举的权利”。针对民众的强烈呼声，穆巴拉克表示：“现行的宪法不存在修改的需要，现行的宪法不应当被视作民主化进程的障碍”，官方发言人则声称：“关于现行宪法的讨论将会危害国家的统一，导致国家的分裂”。穆巴拉克任命的《金字塔报》主编易卜拉欣·纳菲耶更是将“政治与宪法改革委员会”成员称作“危险的政治宗派”，指责该委员会成员“试图劫持全体民众的权利以便实现少数政客的野心”。^②

2005年议会选举前夕，迫于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穆巴拉克宣布修订宪法第76款，终止由议会提名单一总统人选进行全民公决的规定，实行总统的差额直接选举，允许合法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亦允许独立候选人竞选总统职位，同时规定了十分苛刻的参选条件，即只有占据议会5%以上席位的政党有资格推荐总统候选人，独立候选人必须获得议会上下两院和地方议会250名议员的支持方可参与总统竞选。2005年议会选举结束后，官方搁置政治改革进程，强化威权体制和高压态势，压缩民众政治空间，排斥民众政治参与，进而逐渐关闭民众通过议会选举实现政治参与的大门。民族民主党尽管在2005年议会选举中表现不佳，尚且占据超过3/4的议会席位。议会作为最高立法机构，依然处于民族民主党的操控之下。^③ 2006年，民族民主党控制的

① Kassem, M., op. cit., p. 54.

② El - Ghobashy, M., “Unsettling the Authorities: Constitutional Reform in Egypt”, *Middle East Report*, No. 226, Spring 2003.

③ Brown, N. J., op. cit., pp. 26 - 28.

议会宣布推迟举行地方选举，延长实施紧急状态法，安全机构逮捕包括副总训导师海拉特·沙特尔在内的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冻结穆斯林兄弟会资产，判处未来党领导人和2005年总统竞选人艾曼·努尔5年监禁。^①2007年，政府向议会提交宪法修正案，不仅重申拒绝承认宗教政党的合法地位，而且禁止利用宗教从事政治活动，限制独立候选人参与竞选议会席位。^②2008年，民族民主党控制的议会再度宣布延长实施紧急状态法。^③

在2010年底举行的议会选举中，民族民主党以压倒性的绝对优势获得420个席位，新华夫托党和民族进步统一集团党仅仅获得11个席位，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其他反对派政党均未获议会席位。^④2010年议会选举结果表明，穆巴拉克和执政党无意放弃权力垄断，官方主导的议会选举亦无法提供打破民族民主党权力垄断和实现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渠道，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与民主化的政治诉求之间陷于无法克服的矛盾境地。官方的统治模式决定着民众的反抗模式，“缺乏民主的选举”势必导致“抛弃选举的民主”。随着民众广泛参与和具有温和色彩的选举政治之门的逐渐关闭，突破现行体制框架和具有明显激进色彩的广场政治之门悄然开启。民众不再将实现参与的政治诉求寄希望于官方操纵的议会选举，街头广场开始取代投票站成为民众发泄不满和表达政治诉求的首选空间，选举政治转化为广场政治的条件日渐成熟。从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演变为自下而上的广场政治，注定成为导致埃及政治深刻变革的历史路径。民众的参与方式从选举政治转变为广场政治，标志着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进程的终结。

“埃及人争取变革运动”即“卡菲叶”（卡菲叶在阿拉伯语中意为“厌倦了”，多数学者译为“够了运动”）作为超越教俗界限和跨党派的松散政治群体，形成于2004年秋，并无官方认可的合法地位，支持者分别来自世俗反对派政党、穆斯林兄弟会和科普特派基督徒，旨在分享共同的政治理念，寻求政治共识，凝聚反对派阵营内部的世俗政党与伊斯兰主义者，反对穆巴拉克谋求连任和其子贾麦勒继任总统，要求解除紧急状态，结束民族民主党的权

① Arafat, A. D., op. cit., p. 174.

② Shehata, D., *Islamists and Secularists in Egypt: Opposition,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London, 2010, p. 141.

③ Brown, N. J., op. cit., 2010, p. 31.

④ 参见新华网2010年12月7日。

力垄断。^① 卡菲叶区别于反对派政党和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现行体制内的议会选举的温和做法，呼吁自下而上和现行体制外的民众政治参与，同时借助包括卫星网络、报刊、互联网和微博诸多媒体形式，广泛传播政治信息。2005年是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之年，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呈上升趋势，卡菲叶发起组织一系列未经政府允许的游行示威，参加者来自反对派的各个阵营。^② 2005年1月，示威者开始走上开罗街头，占据大学校园和解放广场。4月，14个城市同时爆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集会。5月，24个城市同时爆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集会。^③ 卡菲叶运动的政治实践，一方面标志着教俗反对派政治立场的趋同，另一方面试图挑战官方划定的红线和突破选举政治的框架，首开广场政治的先河，预示着埃及政治发展的新方向。

2011年初，埃及爆发了全国性抗议活动，历时18天之久，声势浩大。本轮全国性抗议活动与2010年底的议会选举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官方操纵选举的特定政治环境，促使民众参与的政治诉求从选举政治转化为广场政治，矛头直指总统穆巴拉克的独裁统治和执政党的权力垄断。1月25日是此次全国性抗议活动的首日，被埃及民众称作“愤怒日”。在首都开罗，数以万计的示威民众走上街头，涌向解放广场，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示威民众不仅搁置世俗与宗教的分歧，而且超越信仰的界限，开罗的解放广场汇集了争取民主的各派政治力量。“突尼斯是出路”取代“宪法是出路”和“伊斯兰是出路”的竞选口号，成为示威民众标志性的政治呼声。此后数日，大规模的民众示威蔓延至全国各地。2月1日，全国各地的示威民众举行“百万人大游行”。同日，穆巴拉克发表电视讲话，表示不再谋求连任。2月11日，伴随着示威民众的愤怒呼声，穆巴拉克被迫交出总统权力。^④ 自下而上的广场政治取代官方操纵的选举政治，成为实现权力更替和政治变革的必要环节。在近代以来的阿拉伯历史上，独裁统治者首次在民众愤怒的示威抗议中交出权力，埃及的政治发展由此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① Browsers, M. L., op. cit., p. 113.

② Ibid., p. 114.

③ Arafat, A. D., op. cit., p. 158.

④ Filiu, J. P., *The Arab Revolution: Ten Lessons from the Democratic Uprising*, London 2011, p. 23.

From Electoral Politics to Square Politics: The Public Political Involvement in Mubarak Era

Ha Quan' an & Zhang Chuchu

Abstract: Over the era of Mubarak, normalize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have provided a legitimate channel for public involvement. The rise of popular forces has formed surging undercurrents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zation and shaped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electoral politics. Nonetheless, being caught in a paradox in which the manipulated electoral politics contradicts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Egypt thus confronts an unbridgeable gap between the sustaining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and the political demand for democratization. “Election without democracy” is therefore doomed to develop into “democracy without election”. Inevitably,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manipulated electoral politics to bottom – up square politics constitutes the historical path leading to profound political changes experienced by Egypt.

Key Words: Egypt; Mubarak; Electoral Politics; Square Politics; Public Involvement

(责任编辑:詹世明 责任校对:樊小红)